

(本稿已在12月2日的《中国社会报》二版头条)

并非“小政府、大社会”就一定适合中国

访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勒德克

工人日报记者赖志凯

科勒德克于1994年至1997年、2002年—2003年两次担任波兰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亲身从事政府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领导工作，为波兰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获得“波兰改革之父”的美誉，并获“中东欧最佳财政部长”、“波兰经济转轨杰出成就奖”等荣誉。日前，出席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第50次会议的科勒德克，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会客室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这位淡黄色头发、脸色有点苍白的副总理一旦开讲，就像开了火的机关枪。他的言语犀利直接，充满激情。他喜欢用大量的排比句、反问句，讲话时不时挥舞双手，并且不断主动要求记者提问。

（小标题）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

记者：你是波兰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的专家，这些年又常常来中国，您认为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可以从波兰改革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

科勒德克：波兰是欧盟成员国，转型过程与融入欧盟紧密相连，因此波兰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必须符合欧盟要求。经过15年的改革，波兰的经济体制已经非常接近原欧盟国家了。而中国却是个非常大的经济体，所以不能直接接受别的规则，而是会参与制定这个规则。

在中国加入WTO过程中，经常有人讨论，要做多少让步？事实上，WTO多哈回合谈判刚开始，中国就有了发言权。中国加入WTO之后，是不是市场经济就来了？波兰加入的OECD（经合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它的制度都是为一些发达国家所设计的，我没有说今天波兰是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确的说，我们已经不是中央计划经济了。我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只有这些成就取得或者完成之后，我们才可以当上市场经济这个称号。市场经济并不简简单单是一种自由的经济，比如说资本、货物、人员的自由流动。对于中国来说，在很多年前这些流动已经开始产生了。市场经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资本经济，市场经济要求自由的企业家精神，以及相应的产权制度。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还有很多的改革要做。

记者：我们确实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现在中国企业总是面临反倾销的危险，欧洲和美国还是不把中国当作市场经济国家？

科勒德克：中国完成市场自由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曾经有一个中国的教授也问过我，从欧盟和美国的观点来看，认为俄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难道他们认为俄国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更高吗？如果它连WTO成员都不是的话，怎么能够说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呢？一位波兰经济学家曾说，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象征。俄罗斯虽然在经济转轨以及市场化的过程中还没有充分发展，但是出于政治原因被称为市场经济。从我的观察来看，俄罗斯被称为市场经济主要是从一些富国的需要出发的。如果中国不限制外国对中国的任何投资，并且没有任何限制这些公司把他们投资形成的利润转到海外的话，我相信外国会把中国称作市场经济的。比如说在2年之后，在2006年之前。

（小标题）政府转型要采取渐进的方式

记者：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私有企业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哪个更重要？两者应该同步进行还是有先后次序？

科勒德克：一个好的政策大概应该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完整性，第二个是协调性，第三个是妥协性。你说的两种方法都要采用，它们是互补的。在1990年代初波兰改革的时候，所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时只有休克而没有疗法，太重视私有化而没有重视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当时在波兰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得到了西方一些经济学派的支持，他们主张尽快的卖掉国有资产，卖得越干净越好。但在出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压力越大，出售速度就会越快；出售速度越快，就会越便宜；购买者就会出价更低。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谁有权力决定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出售呢？同

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俄罗斯，当时俄罗斯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在于当时他们通过很快的出售，而且在出售之前、私有化之前并没有清理公司的管理，而他们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中国目前是一种混合经济。国有部门在经济总体的比重持续下降。当然，中国也可以从波兰、俄罗斯出售国有资产中得到教训。在出售过程中，必须使国有资产通过出售获得利润，出售必须要交税。在东欧，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驱动力，他们实际上是在变卖或者毁坏国有资产用于使他们得到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所以他们对利润，或者国有企业的关注不多。

记者：你怎么看待中国正在面临的转轨和由于转轨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科勒德克：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两个单词之间的差异：**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前者是转轨的意思，后者是一种转变，一种修正的过程。转轨可以清楚的说我们从哪里来，转到哪里去，这个过程的两端是非常清晰的。转变则不同，同一点出发向前进，我们也知道大方向在哪里，但是这个前进是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形态。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在哪里结束。我刚才说了，波兰只是把别人现有的规则接受下来，而我认为中国经济比较好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就把转轨和转变两种过程都考虑在内了。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发展的考虑。在东欧和前苏联，对于发展的考虑比较少。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假设，假设当制度变成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会自动增长，它会解决一切社会发展问题。但是市场经济实际上却不是为这个目的而设计的。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GDP总共才是3000亿美元，俄罗斯是7000亿美元；2002年，中国整个的GDP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俄罗斯是4000亿美元。这样比较就说明中国比俄罗斯更好的适应全球经济。从全球经济的适应过程中获得利益。

（小标题）中国不一定适合“小政府、大社会”

记者：大家都注意到您在这次会上说到中国不一定适合“小政府、大社会”，请问您有什么依据呢？

科勒德克：我们在谈到政府大小的话题时，实际是谈税收问题，而不是监管问题。政府应该监管什么，不应该监管什么，应该是由市场去做，或者由非政府去做。因此，这个问题是，这个政府有多大？在拉丁美洲、东欧地区人们认为小政府越小越好，我认为是不对的，不是政府大小的问题，而是政府效力大小的问题。

记者：政府的大小决定国家的经济状况吗？

科勒德克：世界上许多主要的国家，他们的效力都是大政府。政府由开支状态决定大小，有的占GDP的40%，北欧国家是全世界最大的，挪威、芬兰等等，他们的开支占GDP的40%，而其他的象德国也属于这类。哪些国家小，象日本、瑞典他们都是小政府。比较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大政府国家和小政府国家，寿命都差不多，都是78岁，死亡率也是一样的，成人失业率、增长率也是一样的，通货膨胀也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来看，大政府，小政府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生活水平也是一样的，他们收入分配也是一样。归根到底，小政府不一定好。小政府意味着我们是降低税收，我们剥夺政府的一些资源，使他们不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减少政府规模的话，他们减少的速度应当是能力而定，有些职能要由非政府组织来承担，或者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来承担。

记者：那么中国政府在转轨过程中，您认为哪些部门该“大”，哪些部门该“小”？

科勒德克：中国需要在某些部门减少政府的存在，尤其是让政府退出生产领域。当然有些部门，人力资源以及技术设施方面要加强政府的作用。那么是不是投资于人力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不是政府的责任，他应当适当的私有化。也就是说政府一方面退出一些领域，把资源转移到其他的领域，提高政府的效率，比如说政府要负责制定出一些好的制度，有好的政策，我们会更好的利用我们的资产。

格泽戈比.W.科勒德克，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被称为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1989年，他参与了波兰的圆桌会谈。这次圆桌会谈导致了东欧的第一个后共产党政权的诞生。此后历任联合国经济发展机构研究员，华沙金融研究院院长，IMF顾问，耶鲁大学转轨和全球化研究院院长。2002年—2003年两次担任波兰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997年由于在波兰经济转轨中的杰出成就获波兰总统颁奖。科勒德克精通20种语言，出版了25部著作。近期的著作有《转轨下的全球化和机遇》、《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的经济学》、《后共产主义国家转轨：布满荆棘之路》等。1997年，他被邀请到中国来介绍波兰的转轨经验。